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中国封建王朝盛衰的启示

编者按

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以史为鉴，深刻认识这四个不容易，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

□ 韩 宇

一部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纷繁芜杂，扑朔迷离，但提纲挈领，一言以蔽之，始终有个内在规律在支配着它，这就是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无不幻想江山永固，并为之未雨绸缪、竭尽全力，但结果却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影响中国封建王朝盛衰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顺乎民心还是逆于民心

一个王朝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统治者对民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常常把“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是“舟”与“水”的关系。因而，大凡开国之初的君王都能深谙其中的道理，励精图治、勤政为民，奉行“与民生息”的政策。楚汉战争结束之后，老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汉高祖便顺应民众的需要，实行“无为”的治国安邦之道，使得汉初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经历过隋末大乱，唐太宗李世民认为，“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剖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基于这种认识，他大力倡导轻徭薄赋的治国之策。譬如，贞观二年，关内发生严重旱灾，太宗便诏令各地开仓放粮，赈恤灾民，以使灾民安然渡过难关，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确保了唐初政治局面的稳定。相反，历史上也有一些王朝在取得一时的成功后，却忽略了民众的要求，很少考虑人民的疾苦，任意加重农民的负担，结果加速了自己的灭亡。秦和隋的速亡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成就统一大业。然而不到20年，秦王朝就垮台了。原因固然很多，但很重要的就是秦王朝的苛政和暴政。繁重的赋税以及没完没了的徭役，终于导致了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无独有偶，曾经甲兵云集、风行万里的隋朝也是如此。对于它的灭亡，唐初名臣魏征曾有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隋的速亡关键是隋炀帝的淫荒无度，屠戮忠良，滥兴土木，严刑峻法，穷兵黩武，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就经济上而言，则是由于沉重的劳役和兵役，加之地方官吏横征暴敛，层层盘剥，终于激起百姓群起反抗，导致隋王朝的迅速灭亡。

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

用人，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礼记·礼运篇》就提出用人要“选贤与能”。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强调用人“尚贤”，“尚贤”是“为政之本”。对于一个王朝来说，用人的好坏、得失直接关系到它的生存和灭亡。在古代政治中，大凡杰出的政治家都能坚持选贤任能的用人原则，使人才得到合理的使用，从而使其统治得到最大限度的巩固。历史上，唐太宗就是一位求贤若渴、知人善任的封建帝王。他认为，“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同时，他也认为，“使人如器”，即选拔人才就如同使用器物一样，要用其所长，如果片面求全责备，追求全才，就可能埋没大批有用之才。以魏征为例，在唐太宗与李建成争

夺帝位、暗中倾轧期间，他不仅始终站在李建成一边，而且还奉劝李建成趁早杀掉李世民，以巩固太子地位。然而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从魏征至死不悔的态度中看到了其耿直的本性和经国之才，不仅不计前嫌，反倒委以重任。正因为唐太宗唯贤是举的用人之道，才使一大批贤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围，共同创造了贞观之治的业绩，如“孜孜奉国，知无不为”的房玄龄；“参谋帷幄，寄以心腹”的杜如晦；“每以谏诤之心，耻君不如尧舜”的魏征以及“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李靖，等等。同样是唐朝，在历经开元盛世之后，唐玄宗却过上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骄奢淫逸的生活。重用杨国忠等一批奸臣，致使安禄山、史思明乘虚而入，挑起“安史之乱”，唐朝从此由盛转衰，以致灭亡。

吏治昌明还是纲纪废弛

官吏是王朝统治的基础，一个王朝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吏治的好坏。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盛世无不吏治昌明、官风清正，反之则是纲纪废弛、衰败不堪，甚至走向灭亡，正所谓“国家之败，由官邪也”。以清王朝为例，康熙后期官吏贪污、钱粮短缺、国库空虚的情况已相当严重，“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地方官为固位邀宠，狂征滥派，又私征火耗于民，“竭小民衣食之资，供官司奴隶之费”。当时全国各地官府的杂派之多、陋规之繁，真可谓前所未有。雍正帝即位伊始，就把澄清吏治视为巩固统治的根本大计和当务之急。在他看来，贪官污吏比“盗贼”对国家的危害更甚：“命案、盗案，其害不过一人一家而止，若侵努殃民者，在一县则害被一县，在一府则害被一府，岂止杀人及盗之比。”“所以治天下之道，惟在察吏一事。”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雍正同时向督抚提镇下至州县参游颁发谕旨十一道，历数官场种种情弊，反复表明他“整纲饬纪”“澄清吏治”的决心。他令各省在限期内补足国库的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吏严加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与此同时，雍正解决了官吏俸禄过低和地方政府开支没有保障的问题，具体办法就是实行“养廉银”。总体而言，雍正十三年间吏治有了明显改善。可惜好景不长，到乾隆晚期之后，整个官场弥漫着贪赃枉法、唯利是图、阿谀逢迎的恶劣风气，过着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如此情况，清王朝不能不走向衰亡。直到鸦片战争

的炮声才让大清的君臣从天朝帝国的美梦中惊醒，但为时已晚矣。

开放包容还是闭关锁国

纵观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兴衰史，对外开放时则强盛，而且愈强盛愈开放；闭关锁国时则衰败，而且愈衰败愈封闭。在中国历史上，强盛与对外开放，衰败与闭关自守，委实是两对不可分割的伴生物。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西方学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开放与兴盛，是唐代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唐王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交通畅达，方物来自四面八方。唐朝设有鸿胪寺等机构专门接待外国使节和来宾，许多地方设有商馆接待外商，另设有互市监、市舶司等掌管对外贸易，唐政府接受外国的留学生，又将大批的使臣、僧侣派往国外进行回访，首都长安被外国人称之为“天可汗的世界”。唐朝还实行开放的人才策略，将当时东亚以及中亚地区的人才引进到唐帝国的庞大统治机构中来，使得唐帝国前期能够在其辽阔的疆域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与之相反，清王朝至康熙年间开始进入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期；而同时期的法国出现了著名的路易十四改革。康熙帝和路易十四在经济政策、对外政策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对各自国家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康熙实行重农抑商、闭关自守政策；路易十四实行重商主义、殖民扩张政策；康熙帝的政策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路易十四的政策则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马克思在1853年所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说：“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正如马克思所言，闭关锁国，锁住了中国的发展，亦锁住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曾经持续了两千多年才衰亡的中国封建社会，虽已成为历史过客，尘埃落定的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史亦不能再改变，但它确实能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智慧，其中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借鉴。



从行政编制上来看，秦朝就设立了御史台作为监察机构，设御史大夫、御史官员对官员按章“举核”，并不主动作出评价。西汉就开始设御史台主动考核官员，并且还有刺史下巡、“举谣言”之类的兼听举措，不过到了西汉末年，尚书台下设的三公曹掌握上计考课的实权，监察制度在建立不久，就开始变异。

唐朝将考核从监察中首次分离出来，设尚书省吏部考功司为专门考核机构，每年一小考，三至五年一大考。年终集中考核时，还另从京官中选派威望高者二人分别为京官考和外官考，又设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分别监督京官考、外官考，号监中外官考使，有专门机构，有临聘高官，还有监督人员。这种人员配置放到今天都堪称全面。不仅如此，各州县、部门长官统集所属成员全年的功过表现，根据“善”“最”的多少定为九等，考核结果当众宣读，公开议其优劣，“凡百司之长，岁较其属功过，差以九等，大合众而读之”，“悬于本司、本州之门三日”，最后汇总于尚书省。这种公开性令人惊叹。

宋代考核在基本沿袭唐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新举措：磨勘，即检查复核之意。这对考核成绩偏低官员显得更加负责，是一种人性化的改进。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长官称左、右都御史，分京察与外察。京察，就是对在京官吏的考察，六年一次。四品以上官员自陈政绩，由皇帝裁决，五品以下由吏部考察；外察的对象是地方官吏，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和地方布政使、按察使负责。

清朝增加了对翰林、詹事及科道官的临时考核。对其他官员的考核也是分京官与地方两类。京察六年一次，凡三品以上京官，自陈政事得失，最后由皇帝裁决；三品以下官员有各主管长官出具考语，注明称职或不称职，由吏部、都察院考核。大计是对地方总督、巡抚及其下属官吏的考绩，三年一次，考核程序与京察相似，各地总督、巡抚亦可自陈政事得失，其下属官吏由总督、巡抚出具考语，以称职或不称职注明，最后汇总至吏部考课。

综上，古代官员考核在唐代形成基本建制，宋元明清基本上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创新。总体而言，考核机构日益专门化，也强调与行政部门的系统协调；考核过程、结果也强调公开，力求公正；考核与监察、奖惩、升迁制度挂钩呈现出越来越严的趋势，对考评对象的分类日趋细致，考评方自身的专业化程度也不断提升。

道德考评日益严格

——古代官德考评的启示

□ 涂明君

中华春秋

走向巅峰

——楚国兴亡录

□ 冯敏飞

在楚国吴起变法前后，其他国家也相继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其中魏国变法最早，首先成为最强盛的诸侯国，战国初期曾一度独霸中原。齐国变法后，称雄于东方。秦国变法后，则崛起于西方。楚与齐、燕、韩、魏、赵、秦并列为“战国七雄”，烽

火连天。当然，他们不限于拼干戟，也钩心斗角，只嫌三十六计太少，惊心动魄。

公元前369年是楚宣王元年，也是周烈王七年、魏惠王元年、燕桓公元年、韩懿侯六年、赵成侯六年、秦献公十六年、晋桓公二十年、宋剔成元年。由此可见诸侯国竞争多么激烈，而且，上一年即公元前370年，楚、魏、燕、宋都发生了君王变易的大事，几国同样面临着万象更新的时机。楚宣王继位之初，采取“息兵养民”国策，集中精力忙于国内各方面的改革与发展，对外尽量不介入，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让魏、赵、秦、齐、韩等去混战。国内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后，才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

西破巴蜀

楚国西南有个巴国，本来是难兄难弟。巴国在今重庆、湖北、四川、贵州一带，夏朝称“巴方”，商朝称“巴夷”。后来，巴人跟楚人一样，不满商王，参与周武王伐纣。西周初期分封，巴氏又跟楚氏一样被封为低等的子国。巴国跟楚国难兄难弟，本来是友好的。春秋时，楚与巴联军曾经打败邲国，灭了邲国。他们共同伐中国时，巴国却突然转而伐楚，楚文王大败而亡。从此，两国关系恶化，不时发生战争。此前7年即公元前377年，巴国不甘心经济命脉益泉被占，与蜀国联手伐楚。结果失利，巴国加速衰弱。

公元前361年，楚宣王发动大规模战争，一举攻占巴国南部江山——黔中之地。后来，公元前339—329年间，楚威王又进军巴国最后一道益泉，置为巫郡。随后全线西进，攻占江

州及其北的陪都垫江，并进入云南和四川西南部，彻底解除巴蜀威胁。

北攻强邻

楚国北部强国林立，自西而东平陈着秦、韩、魏、宋、齐等。

当时，魏国正与他的北方之邻赵国争得你死我活，魏师重重包围了赵都邯郸。赵国求救于楚，希望他们从魏国的南面声援。对此，楚国大臣看法不一。名将昭奚恤反对出兵，他认为，楚国如果不援助，魏国必然加大攻势，赵国死守孤城，两败俱伤，楚国可以坐收渔利。而景舍则认为，楚国如果不出兵，魏国有恃无恐，迟早要灭赵，而赵国因外援无望，很容易产生苟且偷生想法，向魏投降，成为魏的属国。如果魏赵合二为一，更加强大，必然威胁楚国。因此，应当出一些兵，鼓励他们长期战下去，才有可能让他们“两弊”。两位大臣异曲同工，但景舍的意见显然更高一筹。于是，楚宣王命景舍领兵救赵。而这时，赵军取得意外突破，魏军大败。楚军不战而获救赵美名，但仍然趁机对魏落井下石，公元前358年决黄河之水以攻长短，收复早年被魏国占去的睢水、汝水间的城池土地。

公元前352年，魏军在襄陵大败齐、宋、卫联军。齐威王请求楚国出面调停，代齐向魏求和。公元前346年，魏与韩又联合伐楚，取上蔡。但总体上，魏国被削弱了，不得不改变战略，同时与齐、楚交好。魏国的如意算盘是“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即让齐、楚两国争相拉拢魏，他们必然发生冲突。如果齐胜楚败，魏可以向南发展，东山再起；如果楚胜齐

败，魏国也可以恢复元气。魏王先派使者秘密访齐，尊齐君为王。韩、赵及相邻小国紧随其后，纷纷表示拥戴齐国。然后暗中派使者访楚，表示希望与楚联手攻齐。

田婴是齐威王少子、孟尝君之父，曾与名将田忌、孙臆一起在马陵俘魏军主帅太子申，杀魏军名将庞涓，史称“马陵之战”。公元前334年田婴被重用为相。迎合魏国战略，策划齐王与魏王在徐州盟会，互相尊称为王，史称“会徐州相王”。

征服齐国是楚威王的夙愿。现在听说魏、齐勾结，觉得受骗上当，勃然大怒。楚威王认为这一切是田婴搞的鬼，便亲自统兵北上伐齐，围薛城即今山东滕州一带。那里自古是中国东部水陆交通中心地带和制造车船的重要基地，兵家必争之地，也是田婴的封邑。齐军大败，只好求和。楚威王说和解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驱逐田婴。田婴慌了，连忙委派张丑前往劝说。这张丑也有个三寸不烂之舌。张丑受田婴之托，对楚威王说：“您这次之所以能胜，是田盼没受重用。田盼对齐国有功，百姓也很拥戴。可是田婴不喜欢田盼，而重用中缚。中缚差得很，朝野都不喜欢，所以您轻易胜他。现在您如果驱逐田婴，田盼一定会受到重用。让田盼率齐军，对您就大不利了。”楚威王听了，权衡一番，只好放逐田婴。

但这时，赵、燕也趁机南下，与楚国与楚国形成南北夹击。齐国不堪承受，只好向楚国请罪，臣服于楚。由此，楚国疆域扩展至泗水之上。鲁、宋、卫等小国见风使舵，由附齐改为附楚。楚国大有统摄北方各国之势。

楚对秦则采取和的战略。公元前357年秦楚联盟，约为姻亲，共同对付强魏。楚国高官迎娶秦公主，秦国的商鞅则娶楚公主。商鞅因

变法之功，被尊为“商君”，分封土地，秦孝公甚至想其赐其王公之位。商鞅没敢接受王位，可是为了扩充自己的领地，竟然趁着丈人——楚宣王病重南下攻楚，公然背弃盟约。不过，楚将此视为商鞅个人行为。秦孝公死，惠文王继位，并开始清算商鞅。楚与韩、赵、蜀等国遣使朝贺，纷纷要求秦国处死商鞅。

东败齐赵

公元前333年，越国灭吴之后，势力仅次于楚，欲谋北上攻齐。齐威王明显感到越国的威胁，自知不是对手，便派使者访越，挑拨说：“目前，楚军犯了一大战略错误，对你们是个难得的良机。楚军正在围攻魏国的曲沃、於中，那离楚国的无假关有三千多里。同时，又重兵部署鲁、齐一带。兵力如此分散，必然造成内部空虚。这时候你们如果出奇兵袭击无假关，长驱直入，很容易取胜。”越王无彊听信此言，随即转而攻楚。殊不知楚军兵力虽然分散，但楚国综合实力强，水陆军齐全，交通发达，迅速从北部调回部队抵抗。结果，越军大败，无彊被杀，越国被灭，全部领土落入楚国囊中。关于楚灭越这样重大的历史，《史记》记为楚威王之时，陈梦家《六国纪年表考证》则说：“楚威王灭越之说不可据”，另有学者认为是楚怀王23年（前306年）。

楚军灭越后，移师北上，又与齐大战，大败齐国。至此，楚国强大到顶峰，其版图，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五岭，北至汝、颍、沂、泗，囊括了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流域。当时名士苏秦对楚威王赞道：“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夫以楚之强与大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